

Buddhism in East
and West

佛教与东西方文化

释本性◎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佛教与东西方文化

Buddhism in East and West

释本性◎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教与东西方文化 / 释本性著. —北京: 宗教文

化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88-0236-4

I. 佛… II. ①释… III. ①佛教 - 文集②东西文化

- 文集IV. ① B948-53 ②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8146 号

佛教与东西方文化

释本性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贺 兵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 10.5 印张 20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236-4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 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中外交流高僧 / 1
- 丝路高僧社会贡献略论 / 8
- 法显与法航：两大师的三大共同点 / 17
- 百丈怀海与汾山灵祐的师徒缘 / 27
- 圆瑛大师与他的四大高徒 / 32
- 试论太虚大师推动中国佛教国际化的
直接动因 / 39
- 白圣长老与汉传佛教的国际化之路 / 47
- 台湾佛教教育先驱慈航禅师 / 51
- 明旻禅师与福州佛教 / 54
- 赵朴初大德诗词中的禅学思想探微 / 57
- 二十一世纪佛教路线图 / 66

佛教的社会服务特殊功能及其正面

社会效应的最大限度发挥 / 78

谈佛教徒的守法与持戒 / 83

养心修心是养生之本 / 89

大善，东方伦理道德的制高点 / 95

侠士、武士、骑士精神与佛教的悲智愿行 / 105

心灵禅修与东西方文明 / 111

开在十字架下的莲花 / 120

华严因陀罗网与互联网 / 129

引力波与佛教的时空观 / 134

沩仰宗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 / 140

福建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 146

略述福建佛教与历代高僧 / 153

关于南北传佛教交融的若干思考 / 158

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中外交流高僧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习近平主席这段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影响的精确叙述，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的重要论述。习近平主席在阐释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时，时常会以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为例证，多次在外交场合谈及佛教，尤其是在古代中外交流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些高僧。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提到了唐代的玄奘大师，称“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讲中列举中韩友好佳话时，提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等人，并称中韩“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9月18日，习近平在新德里演讲时提到来华弘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

说“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 2000 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他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时再次提及玄奘，“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特邦（莫迪总理的家乡）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国，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传经”，并邀请莫迪总理来访中国时到玄奘藏经译经的西安看看。

2015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演讲中提到：“早在 2000 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在我们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汉代使节张骞、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的足迹都曾经到过这里。”2015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提及 17 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的中外交流史上的僧人有东汉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金乔觉，明末的隐元等人。这些僧人通过在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建立起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同时也将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传播向沿途各地。

一、迦叶摩腾与竺法兰

迦叶摩腾，中天竺人（中印度），生于婆罗门家，博通大小乘经典，常游化诸方，曾以佛法化解天竺属国兵争，后居于大月氏。竺法兰也是中

天竺人，自言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后与迦叶摩腾一起外出游方。

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梦金人，身心愉悦，询问众臣金人的来历。有大臣傅毅回奏说：周昭王有，西方有佛出世，所梦金人即是天竺圣人。于是，汉明帝派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前往天竺国求法。在蔡愔等人辗转来到西域的大月氏国时遇到了在此弘法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便恳请二人往汉地传法，于是白马驮经东还，时为永平十年（67）。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带着佛教经籍和画像等到洛阳后，住在白马寺中，两人合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佛法入东土的开端。迦叶摩腾于永平十六年（72）圆寂，竺法兰则继续在白马寺翻译佛经，译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华经》等计四部十五卷。

二、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俗姓龚，东晋咸康四年（338）出生于平阳郡武阳县（今山西县襄垣县）。因三位兄长都年幼夭折，法显大师在三岁时就被父母送到附近的佛寺度为小沙弥，以祈求佛祖护佑。十岁以后，法显大师的父母先后不幸去世，而法显大师对佛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对佛教的信仰也更加坚贞。二十岁那年，法显大师受比丘戒，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在当时，天竺僧人传播佛法大多只重经、论二藏，法显大师有感于律藏残缺，矢志向天竺寻法。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逾花甲的法显大师与同学道整、慧应、慧嵬、

慧景一行五人从长安向西进发，次年在张掖又有僧人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愿与同行，后又得慧达法师加入，西行天竺队伍共计十一人。他们西渡流沙，南越葱岭，东入恒河，历时六年始抵中天竺。同行者或中途圆寂，或返回故国，陪伴法显大师时间最久的道整也最终选择留在中天竺修行，仅有法显大师一人游历北、西、中、东天竺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遍礼圣迹。法显大师不忘求法初衷，浮海东归，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在今山东半岛登岸。后经庐山慧远大师邀请抵达东晋首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道场寺，开始译经生涯。南朝宋元嘉元年（424），法显大师圆寂于江陵辛寺，世寿八十六。

法显大师一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①他是中国求法天竺第一人。在法显大师之前虽然也有人西行求法，但都没能真正到达正法所在的印度，后世玄奘、义净等西行取经，都以法显为榜样，称其“创辟荒途”，立志“大丈夫会当继之”。

②他是汉传佛教律法传承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完整或基本完整流传于汉地的戒律，前后一共五种，其中法显大师从印度带回了的即有三种，并且亲自参与了《摩诃僧祇律》在内的六部六十三卷佛经的翻译，垂百万字。

③他求法途中，游历三十余国，著《佛国记》一书，对西域以及天竺、狮子国等地的风俗、人情、地理等记述甚详，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交通和风情保存了重要资料，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文字。同时在学术界也有观点认为法显大师曾抵足美洲，实为发现美洲第一人。

三、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俗姓陈，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出生于洛州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是中国汉传佛教八宗之唯识宗创始人，世称唐三藏。玄奘大师年幼时，父母就相继过世，随兄长长捷法师在净土寺学习佛经。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洛阳度僧破格以沙弥入僧籍。唐高宗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具足戒。后来，玄奘大师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誉满京师。

大师深感国内译著欠佳，义理含混，因此产生了去印度求法的想法。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五万公里，南抵印度，于贞观五年（631）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全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得到年逾百岁的戒贤法师亲授《瑜伽师地论》等经。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通晓三藏，又用五年时间历游五印十八国，讲经论法，辩才无碍，饮誉天竺，被大乘众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众尊为“解脱天”。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大师携 657 部佛经返回长安，开始了中国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初五圆寂。在玄奘大师有生之年，共译佛经 73 部 1330 卷，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与晋代僧人鸠摩罗什、南朝僧人真谛被后世合尊为中国三大译经家。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西行沿途上百国的情况，也成为后世研究的宝贵材料。

四、金乔觉

金乔觉，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僧人，是新罗王国亲族。唐神龙元

年（705）生于新罗，24岁时落发出家，涉海来到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唐王朝，“舍舟而徙，振锡观方”，后至池阳九华山开山，于九华山弘法75年，参学者慕名而来，清静苦修，以至于形容枯槁，有“枯槁众”之称。唐贞元十九年（803），金乔觉圆寂于今安徽九华山，世寿99岁。相传金乔觉坐化时“山鸣石陨，扣钟嘶哑”，“群鸟哀啼，地出火光”。其肉身置函中经三年，仍“颜色如生，兜罗手软，罗节有声，如撼金锁”。众佛徒根据《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语：菩萨“安忍如大地，静虑可秘藏”，认定他即地藏菩萨示现，尊为“金地藏”。

地藏菩萨的信仰因金乔觉的弘扬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法门广传后世，至今犹兴。九华山也得以与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被一起尊为中国汉地佛教四大名山。金乔觉不仅对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在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且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五、隐元隆琦

隐元隆琦，俗姓林，明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州府福清县（今福建省福清市）。万历四十八年（1620）礼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鉴源兴寿法师出家，法号隐元，法名隆琦。崇祯七年（1634）在黄檗山嗣法于费隐通容，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传人。崇祯十年起，先后住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禅寺、嘉兴府崇德县福严禅寺、福州府长乐县龙泉禅寺等，创立了以黄檗山为中心的临济宗黄檗派，成为明末禅宗的一代高僧。

明清交替之际，隐元于南明永历八年（1654）率徒应请东渡日本，先后住长崎东明山兴福禅寺、圣寿山崇福禅寺、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日本宽文元年（1661）得到德川幕府支持，在京都府宇治郡开辟黄檗山万福禅寺，后发展成为日本黄檗宗。日本宽文十三年（1673）四月三日，隐元隆琦圆寂于京都黄檗山，世寿 82 岁，被日本皇室追赠封号“大光普照国师”。此后，每隔五十年的隐元远忌之日，日本皇室都要追谥隐元，形成惯例。隐元所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也与日本临济宗、日本曹洞宗被称为日本禅宗的三大流派。

结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在这条始于中国，连接亚、欧、非的古道，既是佛教东来之路，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之路，也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之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对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佛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代表，也应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出应有的文化推动作用。这不仅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佛教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佛教将随着这条文明互鉴之路，将和平、慈悲、中道、圆融的精神传播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本文刊于《21 世纪禅文明》2015 年第 2 期）

丝路高僧社会贡献略论

一、引言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由汉代的长安，经河西走廊，入西域进中亚的知名交通要道；另一条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一带的来往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则始于闽粤沿海，主要通往三个方向：一是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二是东南亚诸国，三是南亚以及阿拉伯半岛、非洲沿海诸国。

作为“商贸之路”“交流对话之路”“人类进步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在近 2000 年的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其中，在丝路大漠及海涛之间穿行的佛教高僧们，不仅为佛法经义的传播流布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及域外诸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5 年 5 月 2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特别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 17 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到：丝路高僧们不仅为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还缔结了友谊，为传播先进科技文化也作出了巨大贡

献。这让丝路高僧的形象更加完整和丰满。

本文从一入和一出两个方面，介绍丝路高僧对中国及域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丝路高僧对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方面的贡献

在丝绸之路你来我往的高僧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

最早来华的域外译经大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译经时都大量借用老、庄等道家的术语。三国吴时的高僧康僧会，则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来比附佛教的因果学说。这是早期的佛教与中华传统本土文化的会通交融。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生根、成长，逐渐从对儒家、道家的妥协调和，发展为反过来影响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哲学、思想、风俗、文学、艺术、生命观、价值观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高僧法显（？-423），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399年法显等从长安出发，游历20多个国家，经西域进入天竺（今印度），随后由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再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从海上回到广州，前后历时15年。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法显传》，又称《佛国记》，对所经中亚、印度、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都有介

绍，是中国和印度、南洋之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是研究中国和中亚、南亚地理和航海的重要资料。其中记载了我国最早利用海洋“信风”航海的实例，以及我国最早利用星宿导航的实例。

唐朝高僧玄奘法师（600-664），于贞观元年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17年后从陆路返回长安。唐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十分复杂和密切，非常需要熟悉西域、中亚各国政治、文化、地理、交通、民族、民俗的人才，玄奘因为对这些地区了如指掌，回国后成为唐太宗经略西域最好的顾问。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100多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涉及政治、地理、农商、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宗教等等，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社会史、宗教史、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外，玄奘还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域外。

义净（635-713）也是唐代从中国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671年他从广州到达南海的室利佛逝，即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室利佛逝是当时南海中最大的古国。义净由南海抵达印度后学习了10年，后由海路东归，又在南海一带游历，后来回到洛阳。

义净法师最重要的著作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本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他在书中介绍了当时沿途各地的民情风俗，描绘了中印之间南海一带的政治、文化、交通、风俗、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义净在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带回了印度当地寺

庙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技术，对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印度丝路高僧带来中国的，除了佛学，还有天文、历法、医学、音乐、艺术等。史籍记载，梵僧不仅善诵经咒，并精通医道、天文历算。如《出三藏记集》卷六称“安士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不知”。而昙柯迦罗法师善于星术，康僧会法师通晓图讖。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于开元十七年来华献质汗药，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东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印度医学、天文历法书籍译成中文的有 10 种左右。

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法师，是唐代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金刚智的弟子。他奉唐玄宗之命主持编制了新的历法《大衍历》（后传入日本，行用了近百年），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子午线的科学家。他还发明了水运浑天仪，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高僧一行等发明的平行联动装置，实质上就是最早的机械时钟，是一切擒纵器的祖先。

出生于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344-413）也是主要译经家之一，他通晓龟兹语、汉语、回鹘语、印度语等语种，在佛学、哲学、修辞学、医药学、文学、星象学、音韵学、音乐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到长安后，他所奉献的不仅有佛教经典，还有他的各种才能。比如，龟兹乐舞极富盛名，盛唐乐舞就是在龟兹乐舞的影响下形成的。唐代的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息乐的特点，与西域高僧们的到来有直接关系。

三、丝路高僧对域外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方面的贡献

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也由往返各国的丝路高僧们传播流布，对域外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我们分别从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板块来介绍。

（一）对东亚的影响

唐朝高僧鉴真大师（688—763），中国南山律宗祖师，也是日本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被日本人民尊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

鉴真熟识医方明，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它各种书法 50 卷。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鉴真及弟子也精通建筑。日本著名的招提寺，由于鉴真等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异常牢固精美，经过 1200 余年的风雨，完好无损。鉴真等还在日本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这种夹纻法早在我国东晋时就已出现，到唐代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这种雕塑艺术后来在日本被推广并发扬光大。

日本高僧最澄大师、空海大师，唐代时留学中国研究佛学，归国后，将我国的制茶技术传入日本。空海大师还在中国学习梵文，在此启发下发